



朱乃正画集

ZHUNAIZHENGHUAJI · 油画 · 水墨 · 水粉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朱乃正画集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朱乃正画集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87年2月第1版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20印张：6

统一书号：8073·50316 插页：4

ISBN 7-5305-0025-2

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1000

定价：17元

诚笃·坚韧·旷达

——《朱乃正画集》序

佐 良

二十年前，在兰州的一个美术作品展览会上，第一次见到朱乃正的画。展览会的名称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规模不小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不少当时西北诸名家的作品。在印象中，唯独一幅描绘青海藏族农业区秋收的油画《金色的季节》，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。我在速写本上勾摹了一个小构图，从展览会的留言簿上抄下了这样几句话：“……打破常规，顶天立地的构图，深沉质朴的色调，雕塑感极强的造型，充满激情、潇洒痛快的笔触……画面上仿佛荡漾着音乐的旋律，这才是艺术！”我觉得，这几句不甚连贯的话，颇能代表我当时的感受。留言簿上，赞扬《金色的季节》的意见占明显多数，有的干脆写上两个字：“真棒！”可见人心相通，感受略同。从此，我记住了这个陌生的作者名字——朱乃正。

后来，展览巡回到西安。听说长安美术出版社准备出个画辑，其中选了《金色的季节》。我很希望得到这幅画的印刷品，写信给西安的一位朋友，代我留心。因为这时我正在腾格里大沙漠南沿，古长城烽燧台边的盐碱滩里屯田戍守，买书是很困难的。

朋友笃重友谊，很负责任。来信不时报告消息：已经打校样了，快要付印了……可是，出书的周期太长了，而“文化大革命”又来得如此迅猛，当横扫一切的时候，我那点可怜的希望也就自动消失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却非常意外地收到朋友挂号寄来《金色的季节》的小画片，是托人从即将销毁的出版物中拣来的。我

喜不自胜，赶忙藏起来。据传闻，在那个时候《金色的季节》的原作，被几位爱画的少年潜入库房割成碎片分掉了。我深感痛惜，又暗暗庆幸，因为它虽遭肢解，毕竟还在爱画的人手中，也算“死”得其所。

真没料到，这幅画十几年之后，它竟奇迹般地回到了作者手中。原来，当年它并没有被少年们瓜分，却被稀里糊涂地作为板材钉上了大批判专栏，一位画家发现了它，暗中加以保护。待它“胜利完成任务”的时候，悄悄撬下来带回家去。从此它隐匿在民间十几年，后来又几经辗转，终于回到青海。薄薄的两块三合板，斑痕累累，残损脱胶。如果不是艺术品，而只是这样两块破三合板，恐怕白送给谁家钉鸡窝，人家都不一定看得上呢。

如今，《金色的季节》在北京展出，到香港展出，赴法国春季沙龙展出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、陈列……。它终于获得了应有的位置。但是，辉煌的画框掩饰不了它饱经忧患的容颜，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它身上的累累伤痕。

《金色的季节》的命运，是作者坎坷命运的缩影。

朱乃正是解放后党培养出来的画家。浙江海盐人，少小时生长在江南的大都市，后来到北京求学。他曾和同学们举着鲜花参加了开国大典，幸福地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升起，听到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的庄严宣告。

祖国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黄金岁月。虽然还不富裕，虽然还有困难，但人民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好啊！人和人之间心灵是敞开的。解放初期，良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文化生活，为青年们提供了顺利成长的优越条件。乃正就是在这个时代，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。他早已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，担任过班干部。他发奋学习，尽情地吸收着一切有益的营养，很快就显露了艺术才华。但他并不恃才懈怠，非常刻苦、非常认真地画好每一张作业。他当学生时画的素描，至今仍被中央美术学院作为范画。去年，一家出版社编选素描丛刊，选来选去，还是选用了乃正二十九年学生时代画的一张课堂作业做封面。他是班长，在课堂上常常等同学们都占好了位置，才摆上自己的画架。有一次，他从一个最不佳

的位置，画了一幅出色而似乎未完成的习作，被葛维墨老师发现了，马上拿去给系里的教授们看。著名教授王式廓、董希文等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可以了，不要再画了。”

还有什么能比看到学生的才华被发掘出来，更使老师感到欣慰啊！教员们根据每个学生的素质，有针对性地点、适时地指点；学生解悟三昧，勤奋努力，各各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意气风发的青年乃正，憧憬着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他象一只即将出窝的小鸟，振翅待飞，然而在一场政治暴风雨中，他却被戴上了右派“帽子”，最后，被分配到青海工作。

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需要一切爱国的人们同心同德，同舟共济。乃正怀着极其虔诚的态度，努力地、认真地进行“改造”。他到青海不久，就被摘掉了右派“帽子”。他满以为自己从此回到了革命队伍的行列，感到生活又充满了阳光。前面提到的那幅油画《金色的季节》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。刚刚度过了罕见的饥荒，虽然肚子还不能吃饱，但是，画面上没有丝毫消极悲观的情绪。他热爱生活、赞美劳动，作品洋溢着乐观明朗的气氛。《金色的季节》赢得了那么多赞扬，引起观众的共鸣，因为它体现了当时的民气。民气可用，难道不比世间一切事物都宝贵么？然而，一个运动未过，另一个又接踵而来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乃正成了随时都可能被揪出来推上台的“老运动员”，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，自己早已从新中国的主人沦为二等公民。他把自己那颗曾是火热的心藏起来，连同受党的教育在青年时形成的坚定信念，珍重地埋在心底，默默地承受着各种歧视、打击和侮辱，任劳任怨地、认真地完成交给他的一切工作。我与乃正初次见面，他正在收拾简单的行囊，被临时抽调下乡搞粮油征购。那时，他住在西宁西大街，房间背阴，窗外就是厕所。坐了许久，相对而不知语从何起。临握别，我说：“带个小本，有空勾点速写吧。”乃正苦笑，点了点头，接着又摇摇头。就这样，开始了我们在青海共事的生涯。

青海省处于高寒地带，许多地方是渺无人烟的荒漠。唐诗中早就有“君不见，

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的名句。至今，这个省在很多内地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神秘的、遥远的地方，她多么需要各种人材去开发建设。但说来令人难过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从解放之初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不少人满腔热情而来，却壮志难酬，他们受到的不是“策之不以其道”，就是“食之不能尽其材”，使千里马“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”。

二十年来，乃正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，以他自己的方式，坚韧、顽强地拼搏，执着地探索着，在生满荆棘的荒漠上，不遗余力地开垦，艰辛地进行艺术耕耘。他不计较收获的多寡，甚至不指望得到收获。二十年来，只要是能拿画笔的工作，他都当做是艺术实践的机会。从街头宣传画到商店橱窗；从展览版面画到墙报报头；从广告招贴画到题图尾花；从大小标题到文字说明；甚至裱糊、钉框、刷海报……这些琐碎事，有些自命为艺术家的人是不屑一顾的，乃正却不嫌，什么都干，并且一丝不苟。一张枯燥乏味的展览版面画，经他处理后，都能成为有艺术价值的作品。这本画集中特意选了一幅《焚烧旧契》（《茶卡展览》版面画）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品。读者请看，这何尝不是一幅完整的主题性创作？可惜这类作品绝大部分随着展览的拆除而毁损散失了。乃正相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只要自己的艺术劳动对人民有益，对别人有用，这就够了。他不因为屈才而怨天尤人，灰心丧志。他不消极等待时来运转，幻想有了好的条件之后，再如何如何地大干一番。而是正视现实，脚踏实地，在艰险崎岖的艺术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跋涉、攀登。凭着他的坚毅，凭着他的顽强……能否到达峰巅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自己没有放弃对艺术执着的追求，也就是了。所以他常用罗曼·罗兰的《米开朗基罗传》中最后一段话自勉：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高山顶峰的，但我们必须一年一度地瞻仰一下高峰，以便恢复我们日常工作、战斗的勇气。”艺术是永恒的，个人是渺小的，何况是戴着枷锁的攀登！能有多少自信和成功的希望？

绘画与文学不同。一位作家，只要他在各种境遇下不停止思考，哪怕十年不写一个字，一旦有了条件，作品仍然能够象泉水一样，喷涌而出，飞溅起五彩缤



纷的浪花。绘画有极高的技术性，思想感情的表达必须依靠视觉形象的积累和显现，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是耽误不起的。曾经耳闻目睹有多少画家，逆境中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。后来平反了，改正了，一切都恢复了，但手生了，这致命的一点是靠组织部门恢复不了的。这是谁也无法安慰的悲哀。到头来，不得不自动放下画笔，悄然告别画坛。乃正以自己的方式，二十多年基本上保持着手不拙、眼不生的良好竞技状态。八〇年他获得彻底改正后，被调回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任教。临离开青海之前，为一位老朋友画像。画完后近看看，远看看，相顾神会，微微一笑：“嗯，还行。”说起来轻松，能够数十年保持这个“还行”是多么不容易啊！刚回到中央美术学院，为了教学需要，他画了几幅人体习作，依然保持并发挥了难得的高水平。

有些年轻人爱打听艺术家成功的秘诀。依我说，坚持不懈就是一条“秘诀”。然而，这需要对生活、对大自然、对艺术真诚的热爱，需要坚韧的毅力。在看不到彼岸的狂风恶浪中，作也许是徒劳的拼搏，未必人人有此勇气。

乃正处于逆境时，他也为坎坷和不幸痛苦，但他有相当强的自持力，能够较快地“超然物外”，恢复旷达恬淡的精神状态。即使在挨批斗的大会上，他也尽可能保持着做人的尊严。近几年境遇改变了，一下子有了好几个颇高的头衔，他

依然淡泊自守，保持着头脑的冷静。他鄙视等级观念，不卑不亢、落落大方。与农民、牧民相处，和学生聊天，他十分尊重对方，倾心置腹，相处得和家人、亲友一样。乃正对于某些自以为有身份的客人，他偶尔可能会冷淡唐突。但对学生和学画的青年，却非常热心，常常丢下客人为他们看画。一旦发现有艺术才华的青年，他总是按捺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，披肝沥胆，竭力给予鼓励、扶持和宣扬，往往成为忘年之交。他认为，教师的作用，在于帮助学生认识他们自己，而不是教会学生用老师的眼睛观察，用老师的语言表现。乃正的斗室中，经常坐满各地来的同行和青年学生。他们的画风、追求往往极不相同，但却可以在他这里找到艺术上的共同语言。乃正常说：我从朋友和学生身上得到的，比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要多得多。尤其这一代青年，他们是在我们国家最开放的时期接触艺术的、广泛地吸收知识，得天独厚。他们中很多人，有生活，有素养，有自己的见地，与他们交谈，往往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启迪。

在生活上，乃正随遇而安，所求甚少。青海二十一年，始终斗室一间，屋子里书、画、床、桌、锅、碗、盆，挤得满满地。进去三个客人就转不开身。当了省人大常委，这种情况也毫无改变。他料理生活的本领不大，适应的能力特别强，表现出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。

乃正性格坦率、豁达，城府不深，不屑于耿耿计较个人恩怨利害得失。有人在“史无前例”时期狠整过他，“四人帮”覆灭后表示“悔悟”，乃正即不念旧恶，仍待之以诚，毫无防人之心，以致后来再次着了此人的手脚，亦一笑置之：“由他去吧。”不以为意。

乃正在学生时代，曾十分向往毕业后去云南边疆工作。他当时觉得自己的气质适宜于表现云南傣族、白族、撒尼等少数民族。但是，命运把他抛到青海高原。

古老而神秘的青海高原，象童话故事中的那位表面寂寞、严厉，内心却非常宽厚、博大的老人，你越是接近他、了解他，就会越喜欢他。他会给你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。乃正很快就爱上了青海，称青海为他的第二故乡。到青海不久，就

去柴达木盆地和牧区深入生活，画出了《开发柴达木的人们》、《春耕》、《雪原风情》、《五月的星光》等一批作品。他那时就酝酿搞一组表现开发柴达木的画，那是一个宏大的理想，后来未能实现。原因是容易理解的。当时画家们都不能象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，主观认为自己想画什么就能画什么，想怎样画就怎样画；而只能仰仗客观的机遇和条件。

没有到过青藏高原的人，无论你想象力多么丰富，恐怕也仍然难以想象青藏高原的雄浑壮美。你若从内地嘈杂喧嚣的市井，突然上了高原，会产生象是换了一个天地的感觉。你简直不能相信，在我们这熙熙攘攘的大地上，还会有那么一块毫无矫饰的净土。浩渺无垠的苍穹，覆盖着空旷、辽阔、肃穆的大地，有时竟会产生犹如混沌初开似的错觉，感到天在徐徐升高，地在缓缓延展，以至无边无际。大气清新得似乎没有受到一丝污染，置身其中，仿佛你的灵魂也随之净化……高原上的云，色彩斑斓、瞬息万变、气象浩然而动人心魄。有一著名的诗句中说：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那巫山的云倘若能见到青藏高原的云，巫山云可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正因为乃正胸中装满了青海无数千变万化的云，他到北京后创作的第一幅画就是《青海长云》，把浓烈的、沁人肺腑的高原气息，奉献给首都观众。同时，也寄托着对青海高原无限惜别怀念之情。

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勤劳善良的人们，当然具有高原人特有的气质。东部农业区的汉族、土族、回族、撒拉族，各自保存着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。在内地，许多早已淡忘了、消逝了的传统习俗，仍然在这里绵延。人心质朴，风俗醇厚。牧区草原上的藏族、蒙古族、哈萨克族，在更严峻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，长期形成雄强、坚毅、豪放的特质。乃正对藏族有较多较深的了解。这个居住在世界最高的地方，历史上遭受过深重苦难的民族，更有一种令人不能不动情的淳朴、沉郁、虔诚、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形象特征。在这样的土地上和这样的人群中生活，只要你不是一个榆木疙瘩，你就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当然，不同的人感受会是极不相同的。

艺术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反映人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表现人的憧憬、奋斗、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律动与拼搏。乃正基于比较全面的艺术修养和特殊的生活经历，使他对藏族同胞寄予由衷的热爱和深刻的同情、理解。能够从时代气息、民族感情和劳动人民内在的精神上去认识他们。透过生活现象挖掘出藏族同胞内涵的、本质的美，感受到这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，并用饱含激情的画笔，竭尽所能地表现出来。他的画，渗透着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，凝聚着他深厚、诚挚的感情。但乃正在青海高原强烈的生活感受，当时在人物画创作中并不能得以尽情挥洒、淋漓尽致地表现。他往往把满怀深情寄托在风景画之中，这是一片有几分个人自由的“自由地”。他在青海画了大量风景画，多数只有巴掌大小，篇幅虽小，但画得十分严谨，大都是较完整的成品。乃正对大自然的美有特别强的感受力，非常善于从高原最平常的风物中发现美、挖掘美。赋于山川草木以生命的活力，力求达到超旷空灵、深沉幽渺而又单纯质朴、平易近人的艺术境界。

在“四人帮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，大力鼓吹公式化、概念化的“艺术”，乃正虽不敢也不可能公然对抗，却以最大可能进行消极抵制。他没有随机应变，尽可能站稳脚根，不搞那些违背自己良知的作品。而常常是借题作画，着眼于绘画语言的艺术感染力。凭借着当时允许的题材，表现人的生命力和美好感情。水粉画《第一次出诊》（《新曼巴》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这幅画出现在当时“红光亮”、“三突出”、虚伪矫饰的作品充斥的画坛，令人耳目一新，立即受到美术界和广大群众的注意和喜爱。乃正这个时期的作品，虽然在题材选择、色彩运用、表现手法上，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，但至今回过头来看，每一幅都还具有艺术品最可贵的真情流露。没有一幅是属于象有些人搞的那种赶行情、看风向，当时炫耀于众，如今难以见人的赝品。正因为如此，乃正的作品，在七二年《第一次出诊》如昙花一现之后，直到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再也没有能够参加当时的全国美展。

四凶覆灭，雨过天晴，文艺的春天激发了乃正极大的创作热情，他的创作从

数量到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高峰。短短几年时间,他创作的《让革命骑着骏马前进》(水粉画)、《春华秋实》(丙烯画)、《青海长云》(油画)、《泉鸣》(油画)、《春风》(油画)、《黄河源》(油画)等,均参加了全国性美展或专题美展,并多次获奖,大都为中国美术馆和有关部门收藏。此外,应约为一些宾馆、使馆、博物馆创作了《青海湖》、《春夏秋冬》、《万里长城》等大幅油画、丙烯画;还画了许多肖像和风景,这些就不必细说了。

我想偏重谈谈他的两幅近作,油画《爽秋》和《晴雪》。

《爽秋》是从另外一幅画《红叶》发展而来的。十年前,陈毅同志的遗诗终于出版了。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仰陈老总,喜爱读他的诗文。乃正想取陈总《红叶》诗意作画,含蓄地寄托哀思。画了几个色彩稿,最后选定的是:秋林,枫叶如丹,两个小姑娘在逆光摇曳中将一片红叶夹入诗集。色调美极了。但是,那时正是“四人帮”肆虐最疯狂的年代,这幅画显然非常不合时宜,一直未能上正稿。如今,可以画了,但乃正的构思随着社会深化了。再画那种情调,觉得太不够味儿,也略嫌有些造作。《红叶》只好流产了。十年之后的今天,乃正画出了《爽秋》,基本上保持了《红叶》的色调,保留了枫林红叶。一位山乡小姑娘,在飒飒金秋中,背着一大篓干草,迎面向我们艰难地走来,逆光勾划出她尚待发育的娇小身形,使她的面庞略显朦胧,益发觉得楚楚动人。较之《红叶》,《爽秋》更加发人深省,具有热爱劳动人民的诚挚感情,含蕴着深沉的艺术魅力。另一幅画《晴雪》,描绘青海高原,皑皑雪山,藏女负水。这幅画是《爽秋》的姐妹篇。背着干草篓的内地山乡小姑娘,和这位背水的藏族阿姐之间,虽然在地域上相距数千里,但我感觉到她们在精神上有一种看不见的内在联系。面对这两幅画,我受到强烈的感染,深深感觉到这“背”字的沉重。继而发人沉思:我们怎能忍心还不奋发,开拓进取,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“四化”大业,振兴中华?难道还能让子子孙孙把“一穷二白”的大山背下去么!

既然写文章,就不得不使用文字,但画画的人都知道,用语言文字谈美术作

品是注定吃力不讨好的。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心中难免嘀咕，这也是本文较多谈人谈事，尽量回避分析具体作品的原因。绘画的艺术语言以形象动人，寓教育、认识功能于美的感染之中。观众自然会依据各人不同的阅历和感受，与艺术作品取得共鸣，见仁见智。有些复杂、微妙的情绪，是可以感觉、意会，而很难用语言准确表达的，对这两幅画，很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，乃正也许不完全是这个意思，或者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只是给我们塑造了两个真、善、美的劳动者形象，深沉而不压抑，善良、淳美，充溢着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从诚笃、深邃的生活感受出发，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出对象此时此地特有的造型美感。画面上的人、大自然、劳动，组成了艺术的高度统一和谐的美，纯真、悦目，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要求，抒发了深厚、浓郁而又含蓄的乡情。

朱乃正是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艺术家。他修养全面，对于东、西方美术均有广泛涉猎；尤其对印象派及西方现代绘画十分关注。常常和朋友、学生饶有兴味地讨论这类话题。对凡·高、高庚、毕加索和东山魁夷、怀斯、赵无极等人的一些作品都相当关注。虽然他重视借鉴，但仍遵循自己的路。他没有脱离现实生活，躲进象牙之塔，为艺术而艺术地去研讨形式、结构的科学规律，玩弄形、光、色、线的抽象组合。他认为：艺术的成败，主要在于把握生活、人民、艺术和艺术家自身相统一的精神内质，挖掘时代、民族、生活和人的深度。以真正的艺术形式来反映生活，并不存在“过时”的问题，关键在运用得宜。他要以自己的艺术，反映历史、时代的脉络，从他所熟悉的角度，反映当今社会生活的风貌。

因之，乃正不象有些画家那样，为了急于形成个人风格，画地为牢，钻牛角尖，或脱离生活，单纯追求形式、手法的新颖独出，而使表现的路径越来越窄，作品显得矫揉造作或虚张声势。乃正不肯自我囿于某种范围之内，他在艺术的天地里进行广泛的探索与尝试。油画、中国画、木刻、丙烯、水墨、水粉、粉笔、书法、篆刻，任何造型语言、工具材料都不排斥。一切服从于表现的需要。既不为形式而形式地削足适履，也不排斥适宜于表情达意的任何形式。他几十年来，

以坚韧的毅力，执着追求的是艺术与生活中真、善、美的境界。为此，他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。哪怕人们认为不值得，哪怕人们不理解，他依然坚定、笃实地追求！也许成功，也许失败。

有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乃正白天基本上不能作画，必须应付许多世俗、繁琐的事务，他就晚上画。用单纯的色彩，画出了四、五十幅情调殊异的水粉风景画，冠以总题《银色的梦——幸而还有梦》。这批画，在乃正的作品中，占有一个特



殊的地位。

人人都做过梦，有噩梦，自然也有美梦。美好的梦境往往比现实美得无法比拟。人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：月影、篝火、灯光、薄雾、轻纱……往往改变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，将美的境界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与晴天白日之下的感觉迥然不同，令人陶醉得忘乎所以。美的因素常常潜藏在芜杂的客观事物之中。高明的艺术家善于滤掉掩盖着美感的纷繁芜杂，提炼出美的因素，构成画面。因而，优秀的风景写生常比自然风景更美。人们常说的“风景如画”这个形容词，就是承认真景不如画美。但是，画家在写生中，面对真景，很难完全摆脱客观具象局部细节的干扰；默写就不同了，离开了客观对象，画家能凭记忆画出的，往往是对他印象最深刻、最强烈的形象。乃正《银色的梦》不是某些具体风景的默写，他创作这批画的契机，始于“牛棚”中一段难忘的经历。乃正被关入“牛棚”期间，曾“享受”过单独禁闭的“殊遇”。没有“棚友”，没有书报，除了拉出去揪斗和惩罚劳动外，每天从早至晚，只能望着天花板出神。从未有过的孤独感侵袭着他的心。房屋年久失修，天花板和墙壁斑斑驳驳，乃正望着望着，他几十年丰富、复杂又坎坷的生活在天花板上幻化出种种神奇的形象。他精神为之一振，创造的欲望驱散了孤独感。身陷囹圄，他的心却凭借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漏痕、灰渍，在艺术的天地里纵情驰骋，构成和积累了许多绝妙的画面。他结合这些记忆，将头脑中多年来储存的美的形象，提炼、概括、变化，经过独具匠心地安排、处理，采用方形构图，画面结构集中、饱满，色彩淡雅、清新、毫无消极颓靡的情调。《银色的梦》以具象的人间风雪、山川、林木为基础，用色块与点、线的有机结构，迁想妙得创造出梦幻般的画面，富有艺术魅力，含蕴着深美灵逸的意境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‘理想’与‘写实’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”乃正的《银色的梦》，可以说是“造境”，基于他对生活敏锐而深邃的观察、体验，长期坚持不懈的艺术实践，解悟了艺术规律和形式法则，达到

得心应手，随心所欲。因而他的这几十幅画，概括而不概念，凝炼而不空泛，单纯而不简单。“合乎自然”，却比自然更美。

乃正在书法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成就。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，颇受国内和日本书法界瞩目。他的书法从宋书入手，初学米芾，长期遍临米帖。对米芾“古今相师承，少有出尘格者”的见解，乃正十分赞赏。于是广收博采，上溯汉魏、晋唐，下逮明清，不专一家，加上自己的创意，融会贯通，冶成一体。且正在不断地探索变化中。

近几年，他在教学、深入生活和创作之余，用毛笔和一种近似生宣性能的斗方形土纸，画了许多水墨画。这些画，与他的油画、水粉画、版画比较，是更为痛快、并含蓄地抒发情感之作。随意点染，纵横捭阖，气韵生动，奇趣盎然。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得力于书法的功底，融汇了他对西画和中国画的全面修养。既能看出传统绘画笔情墨趣的熏陶，又能感觉到形式美、抽象美的因素。乃正在艺术上要求自己不重复前人，更不重复自己。每幅画都尽量找到这幅画或这个形象的最恰当的语言，最适合的韵律和节奏。有些油画创作，在已经接近完成时，仍为寻找最得宜、最准确的艺术语言不惜大动干戈，有时干脆涂掉重来。艺术劳动的艰辛、甘苦，实在是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深知。在这些水墨画中，更明显地体现了乃正自己力求“不重复”的原则，至为难能可贵。

这篇拉杂而冗长的文字，写到这里，本可收场了。方才见到近期《美术》杂志，获悉中国革命博物馆、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全国美协联合召开了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，十分欣慰亦十分感慨。不禁想到乃正当年曾有志于创作革命历史画，辛苦地做过许多准备工作。曾搞出了《让革命骑着骏马前进》（水粉画）、《星星之火》（油画）、《白求恩大夫》（木刻）、《难酬蹈海亦英雄》（木刻）等作品。虽然参加了展览，自己仍然感觉不满意，不满足。限于各种条件，已经画出的，觉得还不够理想，且还有不少有想法有草图的题材没有画。他还想画历

史人物画，想画屈原、苏轼、徐文长……有的早就反复画了小草图，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。其中有一幅《闯王进京》，他的想法与众不同。不画夹道迎闯王，欢声雷动；他想画神武门外，镇山古槐之下，将农民起义领袖与自缢的末代君王处理在同一画面上。着重于人物性格、情绪、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，含有哲理性，难度是很大的。小草图效果相当壮观。在乃正的前半生，象这样没有孵出小鸡就被打破的鸡蛋实在是太多了。

朱乃正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画家。他是一个探索者，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，更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。他思考，他追求，他劳作不息。但他却并没有一个先验的“自我设计”，并没有一个自己的“既定方针”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”的遗风。有一位朋友说：“开口奶”极为重要，它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我很有同感。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最紧要三关的往往只有几步。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。乃正是在建国之初朝气蓬勃，阳光灿烂，充满希望的年代吃的“开口奶”，接受的中、高等教育。在思想上、专业上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虽然历尽艰难坎坷，但为国家、为民族效力，尽可能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。他一向认为，没有国家的强盛，民族的繁荣，谈不上个人的事业。他的艺术道路，是和祖国三十多年来的命运息息相关的，他自觉地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。

癸亥中秋于西宁北山